

编者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进一步勉励理论工作者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积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结合,不断凝练标识性概念,推进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扩大中国社会学国际影响力。本期刊发两篇文章,从不同视角介绍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建设取得的新进展。

# 扎根中国实践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

□ 张翼

实践推进到哪里,理论就跟到哪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发展变迁。在此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学人深刻体验与感悟社会变化节律,围绕社会形态的重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转型过程。

## 中国实践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话语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极大激发了社会活力,提升了劳动生产率,畅通了社会流动渠道,拉动劳动力人口源源不断从低效领域进入高效部门,优化了三大产业的从业人员结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3.76亿,这说明中国社会已从定居生活转变为迁居生活。在所有人口流动渠道中,发生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最为常见。在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居过程中,中国社会学人以“农民工”这一饱含乡土情结的创新性概念发展了原有社会学群体理论,丰富了由城镇化推动社会结构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学关系研究。农民工既代表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务工经商群体,也反映了中国农民转化为工人和市民的社会流动特征。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已有占总人口63.89%的约9亿人进入城镇社会。进入新时代,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中,中国社会流动大潮正迅速由农民变农民工阶段推进到农民工变市民阶段。

当前,我国正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收入结构、城乡结构、人力资源结构和阶层结构不断优化。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会增加国内14亿多人民的现代化成色,推进社会文明进程,而且将彻底改变世界人口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比重结构,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发生的社会结构转型,为广大社会学人提供了一个在较短时间周期内亲身观察和深入体验社会全过程变革的宏大叙事蓝本,为中国社会学的话语创新奠定了实践基础,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与核心话语。

## 中国实践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命题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提出了新命题。中国社会学人在聚焦时代主题、发现时代问题、探索时代答案中,不断挖掘学术“富矿”,提炼社会学核心理念,推进社会学理论创新。例如,有关农村社会结构与城镇社会结构变迁问题的研究,有关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研究,有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有关促进社会既充满活力又良序善治问题的研究,有关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问题的研究,有关家庭小型化与家庭结构变迁问题的研究,有关城镇基层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有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问题的研究,有关职业分流与收入分

配问题的研究,有关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转型与消费升级问题的研究,等等。上述问题不仅提出了社会学的基本命题,而且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为社会学发展贡献了中国社会学人的话题创新,激发了世界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兴趣。在对社会学创新命题作出解答的同时,中国社会学人以“中国解释中国社会”的方式,破解了西方的东方学对中国社会的误读,在守正创新中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国际话语权。

## 中国实践构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理论

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强劲转型过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一体谋划,一体设计,前瞻性擘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清晰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如果说有关“小康社会”的话语及其形成的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在前一时期的发展理论,那么,“共同富裕”及与此相关的理论体系必将成为今后30年中国社会学标识性概念。从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的宏大叙事,既统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历史脉络,也

也涵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未来方向。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时,不管是世界市场理论,还是依附理论、后现代理论等,都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些理论也都不能正确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因。唯有基于中国历史与实践而形成的小康社会理论与共同富裕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的伟大产物,在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中日益发挥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因此,由小康社会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所浓缩的社会学发展学说,既是对中国社会成功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凝练与概括。

## 中国实践形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社会治理理论奠定了深厚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人将社会学基本原理与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相结合,一方面促进了社区理论的本土化进程,另一方面推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中的社区营造实践,推进了单位制和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变,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话语。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社会学持续推进有关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问题的研究,有关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有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问题的研究,有关

#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社会学

□ 麻国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社会学在学术传统中不同于比较社会学,它以不同文化的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阐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社会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不断发展。在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实践历程中,社会学较早就提出了“迈向人民”的命题。

1980年,费孝通在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马林诺斯基纪念奖时提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总结和提炼了我国人类学的学科特征。在他看来,对人民有用的调查研究,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者有责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贡献真实反映客观事实的社会科学知识,为建设一个和平、平等、繁荣的社会服务。“迈向人民”的追求揭示了社会学应当是迈向人民的学问,以人民为中心的学问。

社会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为既是社会学研究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社会学的服务对象。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组织着中国社会,实践着中国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学,就是要客观调查人民群众的生活,真诚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在此基础上努力把社会学调查研究所形成的知识体现于公

共政策中,发挥沟通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在近年发展历程中,中国社会学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承发展中国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吸收借鉴西方人类学的应用取向,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塑造自身研究取向和话语体系,其面向人民的学科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调查研究为基本方法。田野调查是社会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和灵魂,也奠定了这门学科从实求知的方法论。二是以社会服务为学科追求。历代学人积极承担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人民团结等方面的重大历史责任,将学术研究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紧密结合,推动社会人类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

回顾社会人类学在我国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在新时代条件下,社会人类学如何更好地理解人民、服务人民,体现人民性关怀?笔者认为,应重点关注以下三大议题。

其一,人的流动与社会结合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人所研究的人群业已成为流动中的人群,而田野亦成为流动中的田野。人的流动问题本质上是由人与物在不同体系间“跨界”而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其影响涉及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族际间的流动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出现了一群规模庞大的离乡又离土的打工群体,进入城市工业体系谋求生存;二是西部大开发以后,大量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进入西部地区和边疆地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流动人口规模近3.8亿人,比2010年增长了将近70%,人口流动更趋活跃。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导致社会结合方式的松动以及传统文化的快速变迁。人口流动将城市、生态、文化等裹挟到社会变迁的浪潮中,带来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流动本身成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特征,流动现象反映了作为过程的中国问题,也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如何结合的问题。人们从传统的社会结合方式中脱离出来,而传统的文化作为一种惯性仍然影响着当前的社会生活,但同时面临着巨大的变迁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不同群体在交往过程中不断形塑新的结合纽带,这些现象同文化传统的适应和不适应之间,导致了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

这也是社会人类学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二,美好社会建设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追求的美好生活就是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上,就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优军服务保障、文体服务保障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如何达成农业高质量、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发展目标,都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重大问题。社会人类学的松动以及传统文化的快速变迁,人口流动将城市、生态、文化等裹挟到社会变迁的浪潮中,带来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流动本身成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特征,流动现象反映了作为过程的中国问题,也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如何结合的问题。人们从传统的社会结合方式中脱离出来,而传统的文化作为一种惯性仍然影响着当前的社会生活,但同时面临着巨大的变迁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不同群体在交往过程中不断形塑新的结合纽带,这些现象同文化传统的适应和不适应之间,导致了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

这也是社会人类学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二,美好社会建设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追求的美好生活就是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上,就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优军服务保障、文体服务保障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如何达成农业高质量、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发展目标,都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重大问题。社会人类学的松动以及传统文化的快速变迁,人口流动将城市、生态、文化等裹挟到社会变迁的浪潮中,带来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流动本身成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特征,流动现象反映了作为过程的中国问题,也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如何结合的问题。人们从传统的社会结合方式中脱离出来,而传统的文化作为一种惯性仍然影响着当前的社会生活,但同时面临着巨大的变迁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不同群体在交往过程中不断形塑新的结合纽带,这些现象同文化传统的适应和不适应之间,导致了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

这也是社会人类学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二,美好社会建设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追求的美好生活就是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上,就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优军服务保障、文体服务保障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如何达成农业高质量、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发展目标,都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重大问题。社会人类学的松动以及传统文化的快速变迁,人口流动将城市、生态、文化等裹挟到社会变迁的浪潮中,带来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流动本身成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特征,流动现象反映了作为过程的中国问题,也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如何结合的问题。人们从传统的社会结合方式中脱离出来,而传统的文化作为一种惯性仍然影响着当前的社会生活,但同时面临着巨大的变迁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不同群体在交往过程中不断形塑新的结合纽带,这些现象同文化传统的适应和不适应之间,导致了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

这也是社会人类学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二,美好社会建设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追求的美好生活就是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上,就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优军服务保障、文体服务保障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如何达成农业高质量、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发展目标,都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重大问题。社会人类学的松动以及传统文化的快速变迁,人口流动将城市、生态、文化等裹挟到社会变迁的浪潮中,带来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流动本身成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特征,流动现象反映了作为过程的中国问题,也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如何结合的问题。人们从传统的社会结合方式中脱离出来,而传统的文化作为一种惯性仍然影响着当前的社会生活,但同时面临着巨大的变迁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不同群体在交往过程中不断形塑新的结合纽带,这些现象同文化传统的适应和不适应之间,导致了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

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问题的研究,有关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问题的研究,有关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问题的研究,有关社区精英与新乡贤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参与治理问题的研究,有关志愿服务参与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有关社区社会工作组织联动问题的研究,有关民主协商与基层群众自治问题的研究,有关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有关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矛盾化解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风险与社会整合问题的研究等,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特征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也搭建了丰富多彩且说理深刻的社会治理理论。中国的社区不同于西方的社区,中国的社区治理也不同于西方的社区治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支撑了中国社会建设与中国社会治理的能力和优势。这一优越性在未来社区建设、数字社会建设、科技支撑的基层治理格局建设中,会释放出更为灿烂的光芒,这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不断完善奠定更为坚实的实践基础。

## 中国实践形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话语体系

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学界应当随时代而发展、随改革而进步、随理论创新而与时俱进地锻造更富影响力的社会学话语和理论。我们不仅要达到有理说得清的目的,而且要努力形成引领国际社会学发展的良好态势。(作者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会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 洞察

在西方社会,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党争民主被认为是民主的唯一标准。但在实践中,党争民主不仅没有实现民主价值,反倒日益暴露弊端,甚至走向民主反面——对内的寡头统治和对外的霸权扩张。究其实质,西方党争民主被资本所裹挟,党派之争和否决体制为资本肆意扩张提供制度便利,日益加剧经济不平等、政治衰败和社会治理失效,对世界秩序造成威胁。

### 思维方式上二元对立,缺乏整体性

在西方党争民主中,政党是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其存在目标就是在二元对立的竞争性选举中获胜以赢得执政权。可见,党争民主从源头上肢解了民主权的整体性和完整性,政党就变成选举机器,对立竞争逐渐演变为极化政治的代名词。在竞选时,政党竞争是非此即彼、二者择一的权力角逐,对立和对抗思维主导整个选举过程。政党初选由党内大佬控制,候选人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党内激进的小圈子说了算。竞选中的观点越极端激进,越能强化身份和阵营标识,吸引本党选民和政治献金者的关注,理性温和的声音被淹没。迎合民粹主义的短视和福利要求也是赢得选票的方法。候选人为了讨好选民,空谈许诺大行其道,放大了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媒体在党争民主中发挥推波助澜作用,给本已对立的党争火上浇油,政治被无可救药地娱乐化、表演化、低俗化,政客们无所不用其极地互相攻击、诋毁、谩骂,整个社会充满被撕裂的戾气。

在执政后,执政党要考虑中期选举或者为下一次大选做准备,主要精力仍集中在竞选上,很难真正回应民众需求,更遑论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实现人民长远利益。美国两党制使得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国会中常以狭隘党派利益和地方利益为重,相互攻击扯皮,造成立法难产和政府停摆。美欧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互为政敌,为了在下次选举中获胜,以出难题、挑错误、攻击诘难为相处之道,难以妥协和包容。极端情况往往会揭露事物本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党争民主仍以物质为头等大事,置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灾难性的死亡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政治分歧,赤裸裸地暴露出政党利益高于人民利益。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党争民主,在权力催化下造成恶性竞争、短视政治、民粹泛滥和社会撕裂。如果长期缺乏具有整合性和包容性的责任主体弥合与协调不同政治团体、阶级阶层的利益分歧,再叠加难以调和的种族、民族冲突,很可能导致国家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崩溃。

### 主导力量上资本至上,缺乏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背后是奴役,平等的背后是阶级特权,人权的背后是资本的财产权。在西方党争民主中,一人一票看似自由平等,但实际上却被资本力量所宰制,转化为“一美元一票”,所谓人民民主实质上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是“1%所有,1%统治,1%享用”。

组织竞选和进行游说都需要大量金钱,为了在竞选中获胜,政党与“金主”结成“权钱共同体”。政党主要通过各种媒体和铺天盖地的广告为自己造势,政党、利益集团和媒体结成铁三角,竞争性选举沦为“富人的游戏”。美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2014年裁决取消了政治献金限制,认为“如何花钱是言论自由的延伸”。此门一开,权钱交易以完全合法的形式普遍存在,金钱以“言论自由”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摧毁选举的人民性和公正性。上台后,政客们自然对“金主”投桃报李,或制定政策法律维护和保障“金主”利益,或直接将公共资源即政府岗位回馈给在竞选中出钱出力的人。

资本不仅可以左右政党,还可以操控民意。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指出:在我们的体制中产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可能阻碍我们进行实质的必要的改革,甚至连公众都被调唆起来扼杀符合自己利益的变革”。因为在“钱策民主”中,人民常常被政客、媒体、利益集团蒙蔽、误导,资本收买的专家、律师、智囊团也会以“客观、专业、中立的立场”对民众进行听起来“合情合理”的欺骗。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政治领域的情形一如商品市场,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一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是作为公民的我们却几乎无法进入这一领域。

党争民主产生的政府是为资本服务的。引发金融危机的资本家们不仅不被问责和追究,政府还要用纳税人的钱帮其渡过难关;而受金融危机冲击丢掉工作的民众却得不到多少帮助。斯蒂格利茨提供的数据表明:从1974年至2014年的40年中,扣除物价因素,占全美人口90%的人民大众的平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占人口1%富豪的平均收入却在飙升。枪支

# 走向民主反面: 西方党争民主弊病剖析

□ 齐惠

管控、全民医保、提高最低工资、提供教育就业机会等最基本最迫切的民生诉求无法得到满足,贫富分化愈演愈烈并呈代际积累之势。

### 政治体制上否决点过多,缺乏责任制

党争民主中以政党竞争、两院制、三权分立等为要素的政治体制,表面上看是为了制约权力、防止腐败,但也给轮流坐庄推卸责任、利益集团操控公权力和分权制约的不作为提供制度温床。

轮流坐庄不仅造成持续治理塔纳,还为逃避责任和回避矛盾提供了制度渠道。对于国家治理而言,重大公共事务如教育、医疗、环境、安全、财政改革等需要持之以恒推进。西式党争民主通过轮流执政,“一届对着一届干”,以否定前任的方式树立自我权威,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政治体制中的责任机制也在党争轮番中被虚化。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美国谈论责任追究时,经常会出现一种怪象:在你责怪民主党的时候,执政的是共和党,在你责怪共和党的时候,执政的是民主党。竞争性选举被认为是西式民主纠正政府错误的唯一途径,但实际上责任自动豁免或者隔代转移的制度违背了治理常识,反而会造成矛盾问题深层次积累。

政治体制对利益集团具有开放性,公权力成为资本的附庸。利益集团与党争民主相伴而生,为党争民主提供生存养料。在少数“巨无霸”型利益集团统摄下,“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能够促成公共利益的达成”只能是合理化想象。大利益集团能够影响政策制度、财政预算和司法程序,甚至可以利用程序阻止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付诸实施。在立法条款中塞入“私货”。于是,“程序民主”异化为大利益集团和政客之间寻租交易的制度渠道,政商精英满口“平等自由”,实际上却在利用公共资源享受特权。牛津大学教授斯蒂芬·林根的分析直击要害:“美国的‘社会不平等’与‘政府不作为’是那样的密不可分。”“社会不平等”与“政府不作为”是美国政治顽疾的一体两面,无论党争民主如何包装,本质上都是“反民主”的,根源在于大利益集团以组织化的形式榨取和篡夺国家权力。

过度分权导致结构性失衡,无法进行负责任的集体行动。政治制度重要功能之一是能够形成决策共识、推动集体行动。美国的三权分立自诩为民主典范,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因否决点过多破坏了集体行动的基础,形成否决决政治。在美国政治结构中,两大政党、立法和司法机构都可以制约政府,常出现由立法、司法部门解决行政事务而政府运作缺乏连贯性和效率低下的局面。立法机构分权均力敌的参众两院,很多时候每一院由不同的政党所掌控,两党议员和总统纷争不止。政治司法化与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相互加强,法院时常成为扩大政府权力的替代性工具。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指出,美国政府的瘫痪是政党的两极化和权力的极度分散导致的结果。这种旨在防止当政者权力过于集中的制度,变成了一种谁都没有足够的权威,无法集中权力做出决策并承担责任的制度。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政治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扫描二维码 查看理论版更多内容